

村上春树

菊池寛

渡辺淳一

岩波新書

吉川英治

夏目漱石

目下书

*Eye on Japan's
Book Business*

李长声 著

窗边的小豆豆

川端康成

芥川龙之介

筑摩书房

菊地信义

直木三十五

源氏物语

讲谈社

新潮社

司马辽太郎

角川书店

石原慎太郎

吉本芭娜娜

野间清治

文艺春秋



日 下 书

*Eye on Japan's
Book Business*

李长声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下书 / 李长声著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ISBN 978-7-208-07905-2

I. 日… II. 李… III. 出版工作—研究—日本 IV.
G289.3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74930号

责任编辑 储卉娟 闫柳君
装帧设计 杨林青



世纪文景

日下书

李长声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10.25
插 页 7
字 数 169,000
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7905-2 / I · 559
定 价 28.00元

序一
读李小记

沈昌文

《读书》杂志在改革开放刚起步之际创立，主持人又是几位一贯提倡改革开放的前辈，所以刊物从一开始就努力提倡引进域外新知。我记得，一开始，最积极从事其事并且带领吾辈开发的是副主编冯亦代老先生。冯老精通英文，海外朋友又多，他组来的第一个海外作者是董鼎山先生。由鼎山先生的作品，我们开始同美国文坛打破隔阂。更神的是，董先生原来就是大陆文化界出身的，所以说起美国文化，都有一个中国的底子，读来特别亲切。

由董鼎山而发展到严亢泰先生的英伦通讯。那是扬之水女士的熟人，写来的英伦通讯也是普遍叫好。

如是若干年，英美发展得可以了，于是我们常挂记一个东邻——日本。

中国文化人关心日本文化是天然的事，可我们却找不到在日本的“董鼎山”，大是憾事。

到《读书》创刊十来年后，这个愿望总算满足：总算找到了李长声先生。

长声先生当时大概还在国内工作，但因浸染日本文化多年，写来已颇出色。不久他东渡赴日，越写越出色。这出色，一方面由于他在日本从事出版行业的工作，较诸单纯的研究者了解更多情况。更主要的是，他有中国文化的深厚根底。令我们当年想像不到的是，他浸淫于中国的诗文化已久，本身就是一个写中国旧诗的诗人。这一来，他写的介绍

日本文化的文章，大有在《读书》的海外通讯中进居首列之概。《读书》杂志单我在位的那些年，就大概发了三十来篇吧。

我当年曾有狂想：如此奇才，久居东瀛，应当是我们出版人努力开发的对象。那时曾想请他编丛书、出刊物，妄图请他帮助我们在日本文化的宝地上，照老上海的说法去“做足输赢”。可惜不久后我退出出版舞台，一切无从谈起。以后同长声先生的交往，就只能在饭桌上了。

长声先生善诗。他同我写信，常引自己的旧赋新作。我没有扬之水文才，既不能唱和，乃至不能读得懂其中奥义。只记得当我赋退之时，他引用自己一旧作说：

龙年竞舸日，遭蹶渡扶桑。

禅定似初入，童心未尽亡。

勤工观社会，博览著文章。

十年归棹后，知非一梦长。

我当时虽然年过花甲，但读到“禅定似初入，童心未尽亡”，不禁大呼知己。只是这以后多少年来我实在老朽了，丝毫无能力“勤工观社会，博览著文章”了。

但我，仍然密切注视着李长声兄的成就，直到现在。

二〇〇八年八月

序二
听李说书

止庵

这些年出了不少关于书的书，有读者写的，有编辑写的，有卖书人写的，有收藏家写的，读来都有意思。但我总有一点不满：书这码事儿，有写书——出书——卖书——买书——读书一系列环节，进而言之，“写书”又涉及作者、收入，“出书”涉及编辑、校对、装帧设计，“卖书”涉及书店，“买书”涉及收藏，“读书”涉及评论，此外还有审查、评奖，等等；而作者囿于一己见闻，往往只说到其中一小段儿。譬如收藏家注重版本，出版社当初推出某种版本时有过何等考虑，他就未必知晓了。我一直期待着有一本书，能够把书的来龙去脉都给讲讲，而且生动具体，要言不烦，不板面孔，如道家常——最近读到李长声先生的《日下书》，可谓于愿足矣。

作者说：“朋友金子胜昭笑问：年将不惑，那你打算做什么？便答曰：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。”（《二十年贩“日”记》）他的研究著作迄未完成，却写了一系列随笔。然而随笔也正是有这个做底子才写得好，也就是说，有大品的分量，小品的态度，何况作者是文章高手，笔下特别有股潇洒劲儿。李长声先生向被称做“知日派”，这大概为有别于“亲日”或“反日”而言。其实彼此并不在同一层面。我读作者的文章，有气量，有见识，有材料，有趣味，“亲日”或“反日”并不需要这些，借用《庄子·齐物论》所说，它们那是“大知闲闲”、“大言炎炎”。至于作者说：“当初有志

于撰写日本出版文化史，很留意数据，而此一时彼一时，数据反倒变成了阅读的累赘。”我倒觉得“数据”恰恰构成随笔里的“干货”，否则写随笔岂不成了扯闲篇儿了。而作者讲的“出版文化”，已将有关书的整个流程涵盖在内。正如其所说：“日本出版之丰富，之精美，之繁荣，对我的震惊盖过了文学印象。”但凡对书有点兴趣的人，读了总能长些见识。

作者说：“倘若这些随笔似的东西有助于业内人士了解日本书业，又能让业外的读者窥见一下出版内情，平添些读书的乐趣，那真是望外之喜。”我也在出版界混过些日子，凭一己经验，以为就中可资借鉴之处颇多。譬如书中所讲“文库”、“全集”、“新书”，以及“匿名书评”等，我们都不妨采取“拿来主义”。说来过去中国的出版人也曾学过几手，譬如赵家璧说：“那时，我常去内山书店，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，有时专诚去浏览新到的日本文艺书。我虽不通日文，但从书名和内容的汉字部分，也还能粗知大概。内山老板见我喜欢书，经常送我一些日本出版商印发的图书目录和成套书的宣传品。我回家后，灯下枕边细细翻阅，颇有启发。我看到日本的成套书中有专出新作品的，也有整理编选旧作的，名目繁多，有称丛书、大系、集成或文库之类，范围很广，涉及文学、艺术等各个部门。其中有一套整理编选近代现代文学创作的大套丛书，都不是新创作，而是已有

定评的旧作的汇编，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。”（《编辑忆旧·话说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》）于是便有了所主编的煌煌十卷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。我读《日下书》，才明白他是受了日本“全集”的影响。以后我们的“外国文学名著丛书”、“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”、“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”、“拉丁美洲文学丛书”等，走的也是这个路子。但据作者介绍，日本此外还有“文库”和“新书”两种形式。“日本出版行业惯行把图书类分为单行本、文库、新书、全集等。文库本平均价格约为单行本的一半。先印行利润高的单行本，赚足了之后再考虑出文库本，细水长流。不少文库版图书一印再印，发行量惊人。”（《打破文库的传统》）“若说‘新书’的特点，首先是轻便，适于袖珍、便携，充分体现了书可以在户外车中随意获取信息这一长处。第二则在于价廉。‘新书’是日本简装书丛书的代表。从广义上说，‘文库’也属于简装本丛书。‘新书’基本是直接出版新作品，凭选题取胜，而‘文库’以改版重刊古典等作品为主，平分秋色，各有各的用武之地。”（《新书文化——中间文化》）我们也出过“口袋本”，多少类似“新书”，不过动静不大，出的也多半不是新书；至于“文库”，无论岩波文库之“选书精良”、重在“教养主义”，还是角川文库之“时尚化”、“读了就扔”，我们好像很少在类似的举动。有一套“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”，但是价格未见特别便宜。这里最关键的，是中国出版

界没能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时候，有计划、大规模地尝试通过“文库”、“新书”这种降低书价以扩大销路的办法，进一步巩固与读者的关系。虽然其间可能有困难，譬如发行渠道和结款方式之类问题，但不管怎样，等到网络阅读兴起，再想以类似办法保住读者只怕来不及了。作者谈到如今日本的情况，也说：“时代发展，纸媒体不再是龙头老大，电视、因特网、手机夺走读者可支配的时间，出版物的统计数字一味增长纯粹是美梦。”（《小林一博：书的三大罪》）可惜《日下书》问世有些晚了。

前面提到“全集”，除类似我们的“丛书”者外，还有作家个人的全集。作者介绍了夏目漱石全集的不同版本，一九三四年岩波书店版十八卷本《漱石全集》和一九七〇年集英社版十卷本《漱石文学全集》，尤其引起我的兴趣。前一种的编辑小宫丰隆的“校订方针来自德国文献学，是‘原典主义’，有原稿依从原稿，没原稿则根据最初发表的杂志、报纸或初版单行本。即使遣词用字有误，若表现著者的个性，就不予订正”（《不同版本的夏目漱石全集》）；后一种的编辑荒正人“认为，有可以信赖的文本，文学研究才会进步。编辑方针是当时在欧美取得显著进展的文本校订（textual criticism），原稿不过是‘第一次数据’，不能仅仅基于它机械地编造定本。著者也会有笔误，文本校订要考虑各种情况，予以订正”（《文本的校订》）。我想与日本的

夏目漱石地位相当的，在中国应该是鲁迅罢。可是我们的《鲁迅全集》，只有一九三八年、一九五八年、一九八一年和二〇〇五年几个版本，二〇〇五年版又不过是对一九八一年版的修订，更多工夫用于注释的改动而不是文本的校订。以上四个版本，居然无一附有校记。注释本终究只是一种帮助读者理解的普及本，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部根据手稿、原刊文、结集的所有不同版本汇校，并写出详细校记的《鲁迅全集》呢，当然这是题外话了。
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

序三 知日当如李长声

刘柠

我“粉”长声老师久矣。

八十年代末，放东洋游学，一年后归来，对日本的兴趣却浅尝而不能辄止，开始留心本土传媒对东土的舆论。但很快发现，绝大多数“舆论”，要么还放不下意识形态的架子，作假正经状，要么自以为是，以为窥一斑而知全豹，对什么都敢乱下判断。彼时正值“文化热”，文化论客们读了两本刚译介过来的西学论著，于是什么词儿大、唬人，便往上整什么。如此“舆论”，与其说是对日本的报道、评论，不如说是对异邦的想像来得更准确。大概正因为看那种东西看伤了，坐下了“舆论”恐惧症的病根，至今怕读记者文字，尤其是那种一味煽情，全然不顾现实客观性与常识的游记体观感文字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长声的文字，是一个异数，对长声文字的发现，无论如何当记一笔。其于九十年代为《读书》杂志撰写的系列日本文化专栏“日知漫录”（九十年代末作为“读译文丛”由中国电影出版社结集出版，书名即为《日知漫录》），是我眺望东洋风景的一扇别致的窗，是了解东瀛出版文化、风土世相的一座精致的桥，对我来说，是“知日”的最初功课之一。在因特网时代到来之前的“寂寞”岁月，许多出版信息、文化资讯，均来自对长声文字的阅读，乃至十数年后的今天，对众多的“日知”文本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在我的记忆及与长声老师有限的交往中，无论是文本，

还是发言，长声老师从未自诩过“知日派”，毋宁在拼命躲避这顶有些张扬的帽子。但纵然如此，在两岸三地及日本的华文媒介上发声之频密如长声者，“知日”的帽子躲是怕躲不掉了。一个既欣慰，同时又不无悲哀的事实是，知日如长声者，鲜矣。悲哀者是太少，以今天两国政商往来之规模及因特网时代信息流通之迅捷，我们本该有更多的知日派；但可资欣慰的是，我们幸而有长声，他对日本社会的观察细微而具体，假之其独特的、恰如其分地融入了些许东洋味儿的文体，使我们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遥远的近邻，得以保持某种持久的热情和大体平衡的视角，因而避免了对邻国的想像在时而很美、很柔媚，时而“很黄、很暴力”的两极间摇摆。一定程度的摇摆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长此摇摆下去，我们照准异邦的战略视野将永远找不到聚焦的焦点。

长声老师对日本的解读，从文学而社会，从艺术而生活；从文人掌故到饮食男女，从民间传说、风俗世相到现代东洋人的待人接物，颇有“东洋文化，一网打尽”的野心和架势，其扫描范围之广，当代中国文人鲜有出其右者。细察之下更会发现，其观察自有独特的视角。大体说来，借用日文表达，是从出版切入，最后“落着”于文化之上。正因此，我一向是把长声之文当日本文化论来读的。

那么，何以从出版切入呢？一来，作者八十年代末赴日以来，长期从事出版，出版既是“志业”，也是赖以糊口的

营生。所谓“远来的和尚会念经”，就长声而言，出版之经，无疑是念得烂熟于心、最有心得者；二来，东瀛大众传媒发达，有冠全球之首的新闻纸购读量和出版物发行量，是不折不扣的传媒社会。谈日本文化总绕不开出版，而从出版切入，则不失为一条有效“链接”日本文化深层资源的捷径。

但是，纵然有再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再深入的观察，如果不能找到一种契合的表达方式的话，也是枉然，至少文字难以广传。近二十年来，纵论日本出版问题的著译也颇有一些，大体难逃甫一问世，便被束之高阁的命运（包括曾几何时的日本畅销书《出版大崩溃》之类），而长声的文字，则始终保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群，每有新著问世，也会在圈内引发一阵话题效应。究其原因，笔者以为表达形式的问题尤为重要：形式问题决不仅仅是“形式”的——所谓什么脚穿什么鞋子，舒服与否，只有脚知道。纵观近百年来国人对日本的观察、读解，在汗牛充栋的文献存量中，有多少是还在被公众阅读的“有效”文字，有多少会继续传承下去，而又有多少是真正为东洋知识社会所看重的“干货”呢？黄遵宪、戴季陶和周作人之所以赢得日人长久的敬重，除了“识”的因素以外，与随笔性的文体表达似应有一定的关联。

日本是随笔大国，随笔产量之大，达泛滥的程度。某种意义上，日本文学，无论是小说、诗歌、戏剧，都可以看成是随笔及其变种。长声老师有时自称随笔作家 (Essayist)，

而不是传统中文意义上的散文家，想来与长年浸淫日本文化有直接的关系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其文字中适性冲淡、机智调侃的一面也确乎与日本文学的随笔传统更“接地气”，而在为文码字的态度上和文章本身所呈现的气场上，则常令人想到知堂的文字。

应该说，长声的文字受日本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这样说，并不单单指文字的表达形式本身，还有文字的节奏、内在张力及其所传达的情绪。“乘地铁去讲谈社，在护国寺下车。地下有直通讲谈社大楼的专用入口，一进去别有洞天，气派的大厅更像是酒店或银行。偶尔到这家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办事，倘若天气好，就顺便逛一逛附近的护国寺。那里有野间清治的墓地，他就是讲谈社的拓荒人（《一代杂志王：野间清治》）。”读到这样的文字，令人不由得联想起川端康成的名作《雪国》开篇的那段著名描写：“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。夜空下一片白茫茫。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……”

就笔者而言，之所以“粉”长声老师的文字，与他对日本的态度是分不开的。读其文，或听其谈论日本的物事，每每共鸣于其对东洋喜而不哈、悦而不媚，拿得起、放得下的心态，简而言之，就是“是其是，非其非”，该怎样就怎样。而“非”的时候，也不是动辄板起面孔，作手持板砖拍人状，而是满脸怪笑地调侃之，好玩之极。以我对旅日华人社